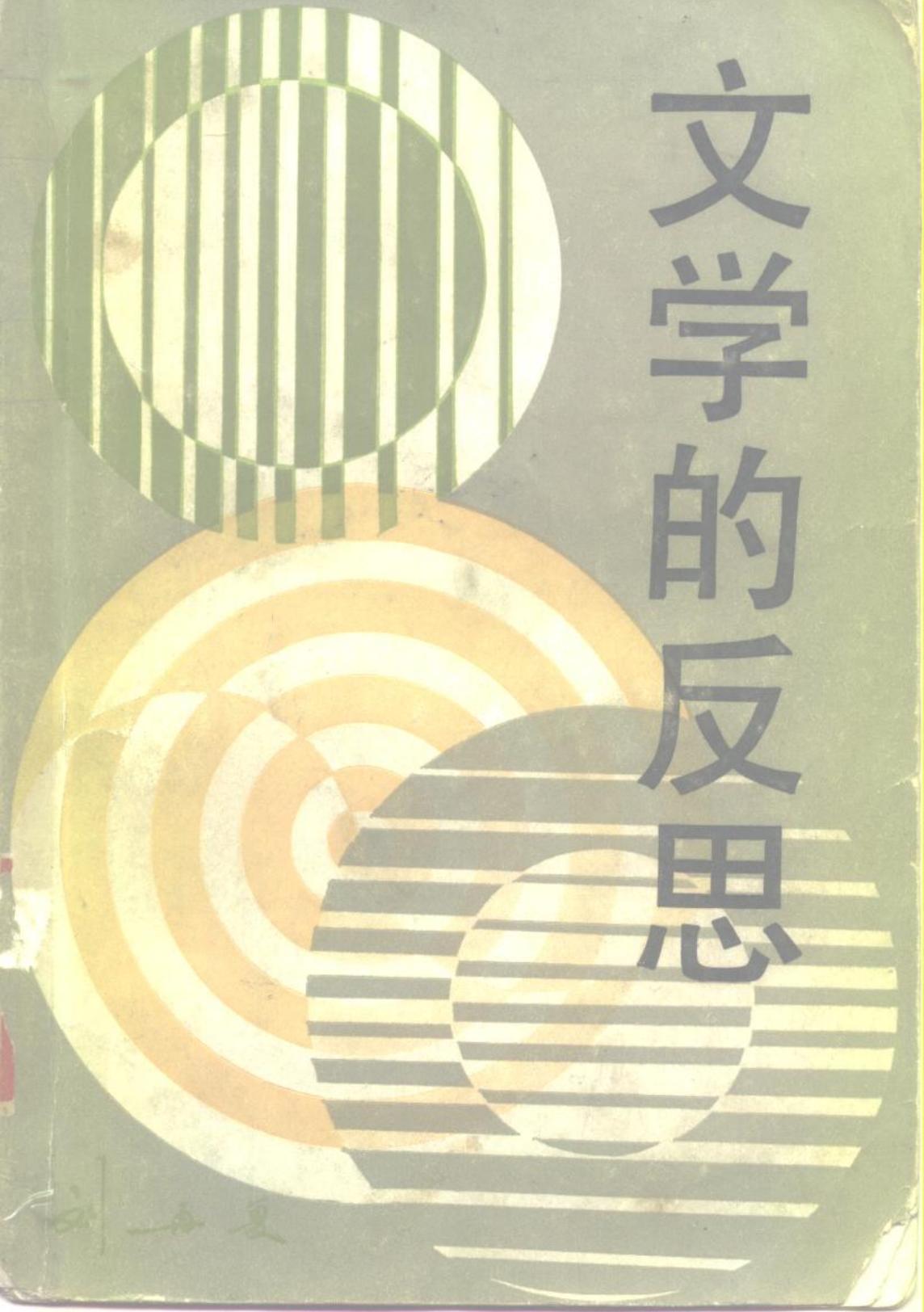


# 文学的反思



# 文学的反思

刘再复



21084884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1084884

封面、扉页设计：徐中益  
责任 编 辑：李 昕、毛承志

文学的反思  
Wenxue De Fansi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 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337,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5 $\frac{1}{8}$  插页8

198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2,000

---

书号 10019·4017 定价 2.90 元

## 文学的反思和自我的超越(代前言)

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发端形式，曾被称为“反思的文学”，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的作家经受“文化大革命”的炼狱之后，确实带着觉醒的良知，对过去的历史进行了痛苦的反省与检讨。新时期文学所以带有较浓厚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也带有深沉的忧患意识，就是这种反思的表现。

近年来，文学上的反思热情显然从文学创作领域涌入了文学研究领域，特别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领域，并逐步形成文学研究者对文学自身的反思，即对几十年来我们的文学基本理论、基本观念和基本思维方式进行重新审视。这种反思目前正在不断深化。如果说，“反思的文学”是对昔日的历史现象进行反思，那么，“文学的反思”则是对已往的文学现象的反思。从“反思的文学”到“文学的反思”，说明我们的文学不安于现状，不断地进取着，求索着。这种“文学的反思”带有四个明显的特点：

(一)宏观性特点：现在出现的对文学的反思，实际上是对文学的宏观反思。具体地说，宏观性反思包括两种意义：一方面是整体性的自我观照，也就是说，这种宏观反思不仅是对某些作家的评价和某个枝节性问题的再认识，而且是从整体上对我国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再思考。这种反思所表现出来的锋芒，是对固定化的线性思维模式的不满，是对窒息文学创作的标签式和棍子式的文学批评的反拨，也是对文学本性复归的呼唤和对

文学创作大繁荣的热切期待。但是，这种整体性的自我观照并没有离开对具体作品的微观剖析。另一方面，则是对过去的文学基本观念和各种文学现象进行一种多角度的综合观照。所谓多角度，就是不仅用政治学角度和反映论角度来观照，而且还用心理学、文化学、系统学、符号学、价值学等多种角度来观照。这些角度不是彼此孤立的，各种角度互相补充，互相映照，从而构成一种完整的立体审视。各种角度都表现出自己的特长，因此看法就比较全面。例如，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觉过去通过文学完成非文学的任务是比较突出的，是可以满意的，但从美学的角度看，则会感到过去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有很大缺陷；而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我们更感到不足。这种综合审视，用王蒙同志的语言说，是一种“密集检验”。在历史上站得住的文学作品应当经得起多种角度的密集检验。宏观式的反思，正是站立在新的历史审视点上，对过去的文学现象进行一次多角度的整体审视和综合检验。

(二)开放性特点：宏观反思，不是闭门反思，而是站在世界的文化潮流中和新的文化高度上进行反思。因此，这次反思具备新的宏观参照系统，例如世界科学文化进步情况的参照系统，二十世纪新涌现的世界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参照系统，中西文化交汇参照系统，我国自身文学的经验教训参照系统等等。用开放性的眼光进行自我观照决不是权宜之计，决不是“热”一阵子，而是我国文学长远性建设所必须的，也是改造我国旧文化传统所必须的。如果不是用开放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根”，就可能分不清优根或劣根，分不清是民族的美德还是劣根性，以至把旧的根子变成鞭子，拿来鞭打新的萌芽。我们吸取了以往的文化经验，意识到只有开放性的眼光，才能看清自己的文化传统，避

免在“寻根”中变成民族劣根性的歌者，也才能在反思中增强面向世界及面向未来的信念。一九二四年，鲁迅在西安所作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讲演中说，中国有两种特别的精神现象，他说：“许多历史学家说，人类历史是进化的，那么，中国当然不会在例外。但看中国进化的情形，却有两种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然而就并不进化么？那是不然，只是比较的慢，使我们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鲁迅所指出的现象是很准确的，他的感慨是很深的。他的旧学根基极深，始终没有忘记“根”，但眼光又极远大，对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祖坟”刨得极不留情。他在“五四”时期用过激的冲击力去摇撼封建的旧观念的“根基”，实在是出于不得已。如果笼统地说他“否定一切”，恐怕不能说是理解鲁迅的。

(三)建设性特点。任何反思都带有批判性质。这一次对文学的反思，当然也意味着对旧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方法的科学批判，但是，这种批判不是简单地摈弃了事，而是带有鲜明的建设性。大多数反思性的文章都力求有正面的学术建树，有自己的理论构想。在反思中，由于反思者努力追求新知，因此，文学知识也不断地丰富。最使人高兴的是，反思中争议的双方实行了“费厄泼赖”，很少火药味。不同的观点，互相补充。过去有些爆破式的文章，则是动辄想吃掉对方，充满刺激性、攻击性和污辱性，这种恶劣文风，造成整个民族的恐惧心理（甚至造成民族心理变态）和对文学批评的厌弃心理，这次出现的反思文章却是多理性而少刺激，这对缓和我国紧张的文化气氛、造成我国正常的文化环境是极有益的。因此，可以说，这是一次软性的宏观反思，而不是简单化的硬性反思。尽管其中有些文章还不够成熟，

但决不是爆破式的；虽然有些是粗糙的，但决不是粗暴的。

(四)主体性特点。反思者有自己的见解，有强烈的自我价值感。他们蔑视简单地沿袭和靠鼻子、帽子、棍子、牙齿为武器的八股文章，而努力用自己独特的评论语言和学术语言，展开独特的美学追求。由于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又有自己选择的参照系统，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工具，因此，他们正在形成不同于前人的现代文体。我们开始看到反思者的自身形象，而且似乎看到他们是在着意塑造自身的形象。不过“着意”并不算成熟，到了无意识状态，到了情不自禁、言无雕琢痕迹状态就更好了。

这种宏观反思有很大的意义。这是我国新文化发展进程中又一次积极的调整，甚至可以说是我国文化现代化建设的一次积极设计。“五四”时期是我国第一次气魄宏大的新文化建设，当时文学理论文章，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称为“理论建设集”。它确实是一次“建设”。但是，当时主要还是立足于批判，而且参加建设的人也很少，那些建设新文化的先驱者们，真有点象我们现在所说的“先锋派”的味道。他们远远地走在时代的前列，也远远地离开最广大的人群。他们的呐喊，往往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应者寥寥。而这一次文化建设，是我国经过长期新文化普及和文化积累之后进行的，它带有更雄厚的文化基础，有更雄大的文化队伍，因此，它将显示出更辉煌的实绩。

正因为此次反思的不平常性，因此，对于在文学上已形成自身的系统观念的同志，就会觉得沉重。我自己就感到学习的格外紧迫，希望通过学习，超越自我的局限。我觉得，这种自我的超越大约包括三个方面：

(一)必须超越自身的思维定式。我们的文学批评从三十年代开始到现在，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大体上是庸

俗的阶级斗争论和直观反映论的线式思维惯性。观察事物的参照系统主要是政治背景。我们不能排斥政治的参照系统，也要充分尊重反映论，但思维的基础仅仅有这两者是不够的。而要超越这种思维惯性是很难的，因为这种惯性的思维是长期形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集体无意识。因此，要意识到自己的思维是习惯性的思维，要从中超越出来，就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力量，但是，这种超越力量必然会转化成巨大的创造力量。

(二)必须超越自身精神蜕变中的痛苦。对过去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反思，常常要涉及到自身已有的观念。自己参与了过去的文学过程(包括文学创造进程和文学研究发展进程)，因此，自身就是这个进程中的内容，自己的观念就是这个进程、潮流中的颗粒，因此，文学的反思就触及到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文章。这是一种痛苦的精神蜕变。深刻意义上的反思，总是包含着严肃的自我解剖。解剖自己比解剖别人还要艰难。因此，这种反思决不是那么轻松的。然而，自我否定并不是自我扑灭，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更新。近日读了《青年评论家》报介绍鲁枢元同志的文章，就讲了鲁枢元经历过一次精神的蜕变。他在给《上海文学》编辑部周介人同志的信中说：“我想再来一次蜕变，但也可能打破我的茧，变不出一只好看的蝴蝶。”而朋友给他鼓励说，祝他变成“一只美丽的孔雀”。我想，鲁枢元同志正是超越了精神蜕变的痛苦，才进入新的精神境界的。这又使我想起郭老“凤凰涅槃”的诗境，如果不经过一次痛苦的涅槃，凤凰就不能再生而翱翔欢唱。总之，如果反思者能想到自己的使命，那他虽然背离了自己的某些观念，却可以告慰了自己科学的良知。他将表现出文学理论工作者对文学事业的忠诚，其结果是他的自我优秀本质反而得到了实现。

(三)超越自身的文化局限。由于在对文学的反思中包含着很大的建设性的特点，纯粹对旧的观念的批判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过去那种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已不够用了。人们还要求文学批评具有新的知识结构，具有生动的、积极的再创造性质。这要求文学批评家有更丰富的文化素养。要求年轻的评论家在发挥自己的文思敏捷、文笔灼人的优点的同时，应当具备更丰富的思维材料，努力避免架空思维。同时，也要求年长一些的评论家不满足于自己掌握的丰富学识，而应自觉增补多种认识角度，使自己的艺术思想焕发“第二次生命”。

我相信，此次反思的思维成果，将有益于文学，一是有益于把文学创作推向前进，二是这些思维成果将进入各个文学研究特别是文学批评领域，因此，又将有益于我们的批评家对文学作品的分析鉴赏，促使其评论更加精彩。可以预料，我们的文学研究领域将有更大的生机。

1985年8月20日

## 目 录

文学的反思和自我的超越(代前言) .....	1
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 .....	
——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动态	1
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 .....	40
论文学的主体性 .....	54
用系统方法分析文学形象的尝试 .....	120
——读林兴宅《论阿Q性格系统》	
古老题材的新发现 .....	128
——读吕俊华《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学 内涵和心理内涵》	
杂谈精神界的生态平衡 .....	139
思维方式与开放性眼光 .....	145
文艺批评的危机与生机 .....	150
• 培育建设性的文化性格 .....	158
• 研究个性的追求和思维成果的吸收 .....	167
• 中国文学的宏观描述 .....	177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 《中国文学》条目初稿	
关于新诗艺术形式问题的质疑 .....	204

• 关于“文学任务”的思考 .....	218
↳ 悲剧的艺术和艺术的悲剧 .....	230
• 论人物性格的模糊性与明确性.....	236
— 个性之谜与性格的双向逆反运动 .....	276
— 两级心理对位效应和文学的人性深度 .....	316
鲁迅成功的时代原因与个人原因 .....	355
论鲁迅杂感文学中的“社会相”类型形象 .....	384
鲁迅悲剧观探索 .....	412
鲁迅论人的价值依据 .....	437
鲁迅的人格力量与艺术气魄 .....	456
鲁迅研究的本质和精华解剖法的生机 .....	467
后记 .....	472

# 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

——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动态

我的这篇文章，谈的是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领域中新出现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发展动态，主要是从方法论发展趋向的角度来谈，也涉及到一些文学观念的变迁。

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和世界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近年来我国的文学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气象，尤其在方法论方面有了更显著的进展。这种进展的事实，已逼使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了解。即使决心一辈子坚持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的人，也不能不注意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并对已有的观念和方法作某种程度的反省和吸收新方法中一部分有益的东西。

新的方法论的介绍和运用，目的在于从更深的层次上理解文学自身各方面的本质特征，更深刻地揭示文学历史发展进程，以促进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繁荣。方法论本身并不是目的，但是，新的方法论，新的审视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接近真理，改变某些不正确的文学观念，踏进更多未知的领域。对方法论的兴趣，是一种接近真理的热情表现。只有对文学研究事业抱着真诚的热忱，才有责任感去熟悉新的方法论，而不会满足于已知的东西。爱因斯坦曾说：“只要存在着这些（理论）目标，科学方法

就提供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可是它不能提供这些目标本身，科学方法本身不会引我们到那里去的。要是没有追求清晰理解的热忱，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科学方法。”<sup>①</sup>

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尽管还有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但是，应当承认，这个领域现在比解放后任何时候都更富有生气，而最明显的特点是在研究工作中，积极性的思维方式已占主导地位，并正在进一步地代替消极性思维。所谓积极性思维，包括三个含意：（1）文学研究的方式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2）即使是带批判性的文章，也注意正面的理论建树。（3）文风上是科学的、积极的，出发点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事业的。总之，不是破字当头，而是“建设”当头。

过去我国思想文化领域里，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积极性思维的命运极坏。凡是正面建树的东西，几乎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遭到批判，被扣上各种帽子。而从事粗暴的、简单化的、非科学的批判，却被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这样，就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极坏的文化性格，这种性格就是拒绝艰苦的精神劳动，蔑视积极性思维，而走一种破字当头的捷径，拿着几个现成的公式和教条，去寻找积极性思维成果中的某些隙缝，然后给予整体性的爆破。这种“爆破手”，不是用脑子生活，而是用鼻子生活，即靠鼻子感知政治气候而生活。这种极坏的文化性格是“左”倾文化政策的产物，它几乎要造成我国文艺科学的崩溃。这种文化性格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其某些恶性元素也或多或少地积淀在我们的思维结构之中，我们如果不注意排除，往往就会重新表现出这种性格的某些方面。蔑视积极性思

---

<sup>①</sup> 《关于理论物理学基础的考查》，《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394页，商务印书馆出版。

维，这是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中一种不幸的、病态的精神现象，很值得研究。但是，近年来却出现一种非常好的情况，这就是大群的文学研究工作者正在改变这种文化性格，抛弃那种爆破式的所谓研究和评论，认真、踏实地进行积极性思维。他们已把研究的重心放在正面的建设上，或者写文学史，或者研究文学史上的某个片断、某个作家，或构筑一种理论系统，或运用一项新的方法去解释复杂的文学现象，他们都立足于建设，即使在研究中对许多已有的观念和方法提出质疑和挑战，也表现出另一种积极的文化性格：（1）他们以积极的建设为目的，不是以爆破为目的；（2）他们对传统观念提出挑战，但这是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进行的，他们对传统的东西采取扬弃的态度，在传统与革新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而不是动不动就“彻底决裂”。近年来，一些中青年的理论工作者在探讨新的方法论中就表现出这种性格。有的同志担心，出现新的方法论，就会否认过去的文化成果，这是不必要的。

近年来文学研究方法表现出来的趋向，我觉得，除了从破到立这个总趋向之外，还有四个趋向是很引人注目的：

（一）由外到内，即由着重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向深入研究文学的内在规律转移。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外部规律，即文学与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例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等，近年来研究的重心已转移到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本身的审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系，文学各种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等等，总之，是回复到自身。

（二）由一到多，即由单一的、单纯从哲学的认识论或政治的阶级论角度来观察文学现象转变为从美学、心理学、伦理学、

人类学、精神现象学等多种角度来观察文学，把文学作品看作复杂的、丰富的人生整体展示，这样，就用有机整体观念代替了机械整体观念，用多向的、多维联系的思维方法代替单向的、线性因果关系的思维方法。例如我们对文艺本质的看法，过去就单纯地从认识论和政治的角度来看，把文学看成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当然没有错，但是，过去仅仅允许用这个角度来规定文学的本质，这就不够全面。事实上，对文学本质的规定，还可从其他角度，例如，从哲学角度来看，可以说，文学是克服异化，使人性暂时获得复归的一种手段；从价值学来看，可以说，文学是人的选择和人格的诗化表现；从心理学来看，可以说，文学是苦闷和欢乐的象征，是人的内心感情活动的升华；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在特定时代环境中，也可以说，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只是暂时的）；从审美的角度看，它是有缺陷的世界中的一种理想之光。

（三）由微观分析到宏观综合，即由孤立地就一个作品、一个作家或一个命题进行思考、分析转变为从联系的、整体的观点进行系统的宏观综合，从而使文学研究在研究作家作品的坚实基础上，又超越一般的作家作品论（见下文详述）。

（四）由封闭体系到开放体系：所谓开放体系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不断吸收外来的文论的养料，尤其是当代西方文论的精华；二是不断吸收文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的养料，包括自然科学的思维成果，以丰富自己的内容和改造自己的形式。

这四种趋向表现出文艺研究工作者的思维空间在不断拓展，并逐步形成四种更可贵的眼光，即更深邃的眼光，更辩证的眼光，更广阔的眼光，更开放的眼光。

反映这四种趋向有很多具体表现，而较突出的有七个方面：

第一，文艺美学的发展使文艺研究从外部向内部掘进。这方

面值得提出的有下列几项：

首先，是关于艺术审美特征的研究。要注意文学艺术自身的规律，就应该探讨艺术的审美特征。这个问题在开展“形象思维”的讨论中获得了深入，而最值得注意的、也引起了争论的是李泽厚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形象思维再续谈》，在这篇论文中，李泽厚提出三个重要观点：第一，艺术不只是认识，不只是反映。他认为，艺术包含有思维——理解的因素，但不能归结为等同于思维。作为创作过程的形象思维，就是艺术想象，它是一个包含着想象、情感、理解、感知等多种心理因素、心理机能的有机综合体。美学本身包括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艺术社会学三个方面，美的哲学部分与认识论当然有关，例如美感能力问题等等，但整个美学却不能仅仅用哲学认识来替代文艺心理学的研究。第二，艺术创造的基本特征在于它的情感性，艺术创作的过程是遵循“情感逻辑”的发展过程（以情感为中介，本质化与个性化同时进行）。情感性重于形象性，情感是贯穿在创作过程中的一一个潜伏而重要的中介环节。这个见解的提出，对于作家把握文学的本质，促进文艺创作开拓人的内心世界，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第三，创作中的非自觉性：艺术创作过程中充满着种种灵感、直觉等非自觉性现象。但这些现象有一个基础，是作家艺术家在日常生活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资料，有过许许多多感受和思维，其中包括了大量的日常逻辑思维甚至是理论研究，以它们（自觉性的意识和逻辑思维）为基础，在艺术创作中才可能出现非自觉现象。李泽厚认为，这样说可以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消极意义，即可以和现代资产阶级各种直觉主义、反理性主义划清界线；二是积极意义，肯定了“基础”之后，形象思维自身的规律和相对的独立性更明显了。李泽厚提出非自觉性问题，并不是

否认创作的目的和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只是正视文艺创作活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特性，正视这种特性，对于文艺创作摆脱概念化，对于作家在创作中进入自由状态，都是极为重要的。以后，他又进一步提出，审美不是一个认识问题，也不仅是情感的表现，而是对人的心灵的塑造，对人的情感的塑造，也就是使人的生理性情感变成审美情感，即建立人的情感形式。他认为，对人的情感的塑造或陶冶，就是感情的人化，这是人化自然的另一方面。人化自然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外在自然，即山河大地的“人化”，这是指人类通过劳动直接或间接改造自然的整个历史成果，另一方面是内在自然的人化，这是指人本身的情感、需要、感知以至器官的人化，也就是人性的塑造。李泽厚这种观念，使我们了解，文学欣赏活动不是被动的，不是消极地反映审美对象，而是包含着审美再创造和心灵的再创造，即情感形式的再创造。这对我们了解文学欣赏乃至文学批评的本质都是很有益的。

文艺美学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动向，是新的美学观念的引进。近年来，结构主义美学、文艺符号学、审美价值学、接受美学等相继传入，确实开阔了文艺研究的视野。仅以接受美学来说，虽然介绍的文章不多，而且还没有把接受美学的系统理论引入，但是张隆溪、张黎等的介绍文章<sup>①</sup>相当清楚地描绘了接受美学发展的主要轮廓和基本面貌。他们告诉我们，接受美学的理论基础是新的阐释学。新阐释学的奠基者罗曼·英伽顿（波兰哲学家）认为，文学作品的本文只能提供一个多层次的未定点，只有在读者一面阅读一面将它具体化时，作品意义才逐渐地表现出来。也就是说，读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作品本文的信息，而是

---

<sup>①</sup> 张隆溪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见《读书》1984年第3期；张黎的《接受美学》，见《百科知识》1984年第9期。